

黑塞和尤瑟纳尔：道家思想与酒神精神

(法) 柯莱特·卡米兰 著
王春明 译

19世纪，佛教思想激起了哲学家和艺术家们的强烈兴趣，但道家思想在欧洲的传播——这有赖于对于老子和庄子的全新翻译——仅仅肇始于20世纪初。佛教思想的根本观念——尘世的整个生存无非痛苦——触动了那些沉浸于宗教感伤，或借用波德莱尔的说法，那些对“世界外的任何理想驻地”孜孜以求的象征派作家和画家，如奥迪隆·雷东¹(Odilon Redon)。兼容包并的玄秘主义在19世纪末蔚然成风，这使佛陀获得了极高的地位，舒雷(Schuré)就将佛陀列为与摩西、赫尔墨斯、毕达哥拉斯和耶稣比肩的“伟大的奥义圣徒”²。实际上，舒雷的神智学(théosophie)内属于“唯灵论复兴”(renaissance spiritualiste)运动，作为对于科学所表现出的物质论和宗教教条主义的反对，这场复兴体现为一种带有瓦格纳崇拜的理念论、一种时常混杂着沙龙无政府主义的神秘主义复苏。此外，在当时的象征派圈子里，叔本华哲学得到了广泛地阅读和评论。这位哲学家经常参照佛教学说³，认为在佛教学说中有着与其学说相同的关于人类生存的观念。他认定：“苦难乃是整个生命的根底”⁴。他甚至将自己等同于佛陀：他写到，自17岁起，他就“如同年轻时的佛陀一样，对疾病、衰老、苦难、死亡有所感知，为生命的悲惨性所攫获”⁵。

如果说在1880年间，人们只是凭着“神圣的阿尔图尔”⁶起誓，那么在1900年间，出于对象征派唯灵论的反对，尼采就成为了诸多欧洲年轻知识分子“真正膜拜”的对象⁷。事实上，在20世纪初，转折就开始了，米歇尔·戴高丹(Michel Décaudin)将这一转折描述为“象征派诸价值的危机”⁸。用尼采的话说，这一转折随之带来的就是“诸价值的颠覆”：以生命的诸价值来对立于精神的理念，“伟大的健康”对立于颓丧的忧郁，身体与大地的激昂对立于“彼岸世界”。1898年亨利·阿尔贝尔(Henry Albert)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翻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乃是1900年间出版业的一大功绩⁹。

19世纪末，对于那些当时尚鲜为人知的道家思想家的全新翻译正是在这一知识界背景下被接受的。实际上，耶稣会士汉学家曾经更倾向于开展儒学研究，他们故意将道家学说混同于巫术和萨满教，认为儒学能够与天主教相容不二。自

¹ 奥迪隆·雷东，《佛陀》，1906，藏于巴黎奥赛博物馆。

² 舒雷，《伟大的奥义圣徒——宗教隐秘史初探：罗摩、奎师那、佛陀、琐罗亚斯德、赫尔墨斯、摩西、毕达哥拉斯、耶稣》，巴黎，Perrin et C^o出版社，1889。

³ 叔本华给出了一张极长的欧洲佛学研究书单，其中囊括了26部著作（见《论自然中的意志》，“汉学”章节。巴黎，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出版社，1969，187-188页）

⁴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奥古斯特·布尔多(Auguste Burdeau)译，Alcan出版社，1888-1890；理查德·鲁斯(Richard Roos)重新校订，巴黎，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出版社，1966，393页（斜体为叔本华所加）

⁵ 见理查德·鲁斯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导论中所引用的叔本华1831年笔记，同上，VIII页

⁶ 即叔本华一译注。

⁷ “现在，这是一种膜拜，一种真正的膜拜”。德·帕拉来斯(V. de Pallarès)，《偶像的黄昏：尼采，尼采主义，尼采派分子》，Bernard Grasset出版社，1910。转引自里德尔(J. Le Rider)，《尼采在法国：从19世纪末到现时代》，巴黎，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出版社，1999，93页。

⁸ 米歇尔·戴高丹，《象征主义价值的危机：1895-1914，法国诗歌20年，1895-1914》，巴黎，Privat出版社，1960；日内瓦Slatkine出版社1981年重版。

⁹ 见雅克·勒·里德尔，同上，105页